

陈翰笙 著 冯峰 译

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

——华南农村危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F3
1

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

——华南农村危机研究

陈翰笙著 冯 峰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原系英文本，1936年由纽约国际出版公司出版。这个新译本在国内是第一次出版，略去了附表。

2843/31

20

Landlord and Peasant in China

A Study of the Agrarian Crisis in South China

By

Chen Han-Seng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New York 1936

根据纽约国际出版公司1936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韩育良

责任校对：李小冰

封面设计：张明

版式设计：韩锐

解放前的地主与农民

——华南农村危机研究

Jiefang Qian De Dizhu Yu Nongmin

——Huanan Nongcun Weiji Yanjiu

陈翰笙 著

冯峰 译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四川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5印张 87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册

统一书号：4190·202 定价：0.56元

F329.6
1

263666

鸣谢：本书作者感谢中山文化教育馆和广州岭南大学的财政援助——前者支持了为撰写这部研究著作而作的农村调查，后者支持了这部调查记录的发表。作者还想感谢太平洋关系学院国际研究部的布鲁诺·托斯克先生和W.L. 霍兰先生在编辑工作和其他方面提供的帮助。但是，这些机构和个人的帮助并不意味着它们或他们之中的任何机构或个人要对这个报告中阐述的事实或意见承担责任。

陈翰笙

前 言

我们未能按照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事实和资料及时分析研究，这是我们时代（令人遗憾）的陋习。我们在手边所掌握的情况远比所利用的要多。面对着敏锐的社会情况，我们也完全有可能屈从于自己的主观愿望，抓住事物中所同情的那些部分而不顾其他部分和整体，紧密与现实联系起来，而不能以历史的观点来加以仔细观察。在社会各界人士当中，也许有不少被看到的景象所吓倒，结果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到一个所渴望得到的梦想世界的社会。

在国际事务的领域里，也许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在那里，唯利是图的机会主义者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诡辩的伎俩。近来，在我国，还不到二十年，才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群众逐渐认识到其中的一些因素。甚至在今天，除了通过参议院的否决权外，民主政府的制度尚未直接扩大到外交关系。在这个黯淡的领域里，中国的情况显得更为模糊不清。中国很少为美国人所了解，只是在感情上对它的古老文明肃然起敬，认为它是注重实际的西方人难以理解的神秘事物，而却为贪得利润的人们所梦寐以求。

这并不是由于手头没有了解它的方法——至少这不是

主要原因。因为我们还没有利用这些知识和资料来进行处理；也没有听到能够说明情况的种种事实。陈翰笙博士的研究是我希望可以证明与此相反的情况。这是一部极为重要而又及时的著作。它论述了解决中国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关键——土地问题，即：土地的利用，土地的所有权，租佃，租金和其他税收的形式，以及这些现象对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影响。它论述的是正在围绕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的一个问题。陈博士提供的事实，在我们看来都是准确的，因为他本人作为一个学者享有很高的名望，也因为曾把这些事实同已在中国作过的农村调查进行过比较。他根据这些事实作出了一些论断，其中有些是最近的，有些则较为遥远。这些论断都是一种解释，不可能象所根据的事实那样客观地被证实。然而根据我们对中国，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演变，以及对包括在中国这个方程式里的作用和反作用所知道的情况，却可以对这些论断加以检验。陈博士的这部著作，如果能得到利用，将大大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以及美国对远东局势的关系。

我们有些人自始至终同意陈博士的解释和预言。另一些人则在事实和作者所相信的基本意义方面有所疑难。他所说的话，对于有些人而言不是易于消化的，然而它可能是实话。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对他所预见的结局将大为高兴。对于这些人，我奉劝他们要特别小心地克制自己的主观愿望。但是，不论是我们的预测或倾向，如果我们不从社会的角度利用这种研究，如果我们不应用它的各项结

论，或以同样科学的方法驳倒它们，则我们便将否定社会活动的全部理性基础。

弗雷德里克·V·菲尔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于纽约

引 言

这部研究著作谈的是广东省的情况，这不仅是因为农民的贫困在这个地区具有内在的、本地的重要性，而且还因为这个地区最清楚地表明了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对农村生活和中国本身阶级对抗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该省约有三千二百万人口，密度约为法国的两倍。它是最富庶的省份之一，除了主要的谷类植物之外，还有各种水果、甘蔗、樟脑、橡胶和其他热带产品。这里的草木长得比中国任何其它地区都更为茂盛；土地提供收成的次数十分密集，除了在高山地区以外，稻米一年收获两三次；这里的桑叶一年可采七、八次。广东拥有中国最好的公路系统之一。随着汉口—广州铁路的竣工，它的贸易范围在一年以内将不仅扩大（就物质设备而言）到长江流域，还将扩大到西藏高原。

尽管这里是比较富饶的，但劳动力却以惊人的速度在流失。华南的劳动力曾被戏称为主要的“出口商品”，侨居国外的工人从国外汇来的一部分工资构成了中国这一地区主要的金钱收入之一。在一千多年以前那个朦胧时期，广东不仅是这个国家第一个开展海外贸易的地区——最初跟阿拉伯人，后来跟葡萄牙人，最后跟英国人和其他西方人——

而且有数以百万计的广东农民侨居国外。英属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大多数商人，锡矿工与烟草、甘蔗、橡胶种植场的工人，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的大多数中国苦力，中国厨师和中国洗衣男工，都是来自中国这个最南部的地区。这里的农村情况不断迫使他们背井离乡。但是在近代，这些农民在他们祖辈的土地上劳而无功，这对于他们来说，已不仅是暂时出国劳动的一种理由。这种情况所具有的规模已经使得土地本身存在着丧失其生产财富的特性这样的危险，因为土地的生产能力再也保不住了。在中国人以往不断前去的那些国家当中，大多数国家都已实行了严格的移民限制，而且这种限制还在加强，在家乡，祖传的土地本身正在变质，耕种所得的收益越来越少，如果土地问题得不到合理解决，人口的流动和对外贸易都无疑地将会出现新问题，这不仅对于中国，甚至对于整个世界也会产生不祥的后果。

倘若中国的工业能以一九三〇年以前的美国或一九三〇年以后的苏联那样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则广东的这些农村无产者和半无产者就不会到那些遥远的欧洲殖民地去卖命了。其实这种人为的人口过剩乃是缺乏足够的工业化的土地垄断的必然产物。在广东，三分之一的农户每户拥有的土地不到五亩，将近半数的农户完全没有土地，全部耕地有百分之六十以上是从地主那里租进的。中国最南端的公田制度，尤其是族田制度，只是加强了垄断者的地位。约有百分之八十的广东农民按他们所属的宗族生活在一起，这是因为他们最初就跟族田联系在一起了。现在，在

该省的全部四千二百万亩耕地中，百分之三十五是族田和其他各种公田。广东族田每年的租金高达一亿二千六百万元，如此巨大的租金收入加上其每年的利息，往往使广东的省收入和国家收入的总和得以增加一倍。集团地主的如此重大的影响，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地主史上都是找不到的。

在这么一种垄断的农业土地制度下，我们必须把税款和租金看得同样重要，大部分税款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农田勒索来的，其数额视农田的大小而定。广东的田赋因两项新政策而大为增加。第一项是最近加紧修筑公路，借口是改进农村交通，但主要是为了便利军事活动。第二项是改组村政府，美其名曰农村自治，但是主要是为了推动征税。在过去五年内，总的田赋负担增加了两倍，这种负担大都转嫁到不得不付地租的那些农民的肩头。通常用谷物偿付的地租，高达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十到五十七。没有人会把这误会为资本主义的地租。如此高昂的地租，加上所有随之而来的各种负担，压在农民身上，并把他们驱逐到高利贷者那里。在该省的任何一个地区，在全部农户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九十是负债的。许多农民借贷谷物度荒；有些农民只能典当他们的衣服、家俱，甚至锄头、草耙、耙子、犁，等等。谷物贷款的利息通常半年为百分之三十；当铺的月利是百分之二到三，有时高达百分之六。没有人能够想象资本主义的利率会高到这种程度，或者有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可能有这么高的利率。破产的农民通过抵押过程迅速失掉他们的土地；由于不被工业接收或“吸收”

的无地农民不断增加，工资总的说来正在下降，各种形式的租金则在上升。这样一来，破产现象便一再重演，并且加速着这一过程，直到农民无产阶级化（在中国，说得更确切些，是贫穷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农民流亡的速度和缓慢的工业化速度。中国目前的土地垄断制度，只能把永久的所有权赠与得天独厚的少数人，同时又把永远还不清的债务强加在日益增加的群众身上。

很明显，在这种土地垄断的情况下，动摇着整个经济的是租金而不是资本。在中国占优势的非资本主义关系，在极小的农场单位上得到进一步的反映和表现。这种不适当的耕种规模确实排除了农村信贷的可能，并妨碍了资本本身的自由活动。仅仅是农场规模的大小，当然还不能说明农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前资本主义的。判断这一点的标准应该是生产的内容与条件，诸如作物的性质、工具、肥料、劳动力的强度等等。例如在美国，北部的农场单位小于南部，但是北部的资本主义农业肯定比南方发达。虽然从国内战争以来，南部农场的规模大为缩小，但南部的农业却变得更为资本主义化了。因为在美国，在耕种面积减少以后，劳动力在总的生产成本中占的百分比便高起来了。但是中国的情况却迥然不同。虽然原始公社式耕作的残余正在迅速消失，虽然宗法式自给自足的农业也在国内许多地区分崩离析，但是谋求农村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企业家仍是凤毛麟角；中国农业占支配地位的形式，仍是为简单的商品生产而耕作的形式。由于地租过高，贫农和中农得不到足够的土地以使用他们全部有效的劳动力，并充分利

用他们哪怕是已经过时的工具。在广东，就连富农每户也只耕种二十五亩，每个有劳动力的人耕种不到四亩。中农每户平均耕种十二亩，贫农每户平均耕种不到六亩。若把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则每户耕种五十亩以上的只有百分之一，百分之二十九每户耕种五至十亩，百分之四十三以上每户耕种不到五亩。绝大多数的农民，其中包括全体贫农和许多中农，实际上正在一块块极小的土地上衰落下去。在这种小到了可笑程度的农场上，生产者只能咒骂商品化的农业的种种弊病，从来也得不到真正资本主义式的发展。

虽然我们说中国的农民经济还不是资本主义的，但是我们绝不可误认为它仍是纯粹封建主义的。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模式早已被歪曲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广泛的国内贸易和各种高利贷的流行，促进了一种新的经济制度、一种商品化的农业的发展，这种农业表明地租、税收、价格和利息等各种力量开始相互作用。靠地租为生的地主、靠五花八门的税收过活的官僚和军阀，靠操纵价格为生的商人和买办，以及靠过高的利息过活的高利贷者，甚至比当代垄断资本的董事们勾结得还要紧密。但是这些人积聚的金钱，正如海外华侨汇寄回家的金钱一样，大都更广泛地变成了地产。土地集中的过程只能使一种前资本主义的农村经济制度永久存在下去。

大约在设立长江各口岸以便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之前的一百年间，现代国际贸易一直是在广东进行。

从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广东实际上是中国唯一向外商开放的地区。所有进口的鸦片和布匹，以及所有出口的茶叶和绸缎，均通过洋行之手。广州的这些洋行，是今日买办式人物的祖先，他们在厦门和宁波，在上海、杭州和天津十分活跃，通过代理业务和敲诈勒索，疯狂地积聚他们的财富。最著名的行商也许是何魁（Howqua），他的全名是吴怡和（1769—1844），英国贾汀和马西森公司为了纪念他，便取了“怡和”这个中国名字。据《印度邮报》（伦敦，1844年6月6日，第264页）称，“他把他自己辛勤劳动的收获约两千六百万美元留给了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才十六岁”。但是积聚的这笔巨额财富已经减少了，其中有许多被用于购置地产和放债收租。外国的商业无疑加速了财富的积累，在中国的条件下，这种财富的积累只是加强了土地的集中。在中国所有的省份当中，广东受国际贸易的影响为时最长。在中国所有的富饶地区当中，广东在阶级分化方面走得最远，也就不足为奇了。

凡是研究过中国当代史的人全都清楚地知道，外国的商业用它的火车带来了工业资本的深远影响。工厂制造的商品日益增长的进口，使全国的手工业趋于衰落。金属制造工，不论是铁、铜、锡还是银的制造工，陶工和瓦工，油漆匠和家具制造工，裁缝和制革工人，制绳工和木刻工，特别是缫丝工和棉纺工，全都因现代工业品（其中大都是外国货）的冲击而感到前途渺茫。这意味着来自家庭生产或来自农民辅助劳动的收入不断下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手工纺织业突然复兴，这是因为进口纺织品的价格因

战争环境而上涨。譬如说，在那个时期，仅在南海县的一个镇里便有近万名农妇从事手工纺织。但是如今中国正从陷于自身的经济危机中的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接受倾销的全部后果。近几年来，进口纺织品的价格下跌了一半以上，于是手工纺织就再也维持不下去了。除了大幅度削减织布工的工资之外，这个镇约有八千名妇女失业。城镇的失业者如今又被赶回他们当初从那儿前来的农村。在目前的情况下，现代贸易肯定正以前所未闻的巨大规模加剧着农村贫困化的过程。

早在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在长江的若干口岸向外商开放以后，中国的贸易和高利贷资本就不再把它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国内市场，而是开始跟外国的工商业活动挂钩了。于是象中国商船航行公司之类强大的买办机构便应运而生。实际上大约就在这个时期，随着外国势力的增长，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官僚，即买办式的官僚。这种人物的第一个最著名的代表是李鸿章。他的老师和上司曾国藩还是一个旧式的封建官僚，而他却跟曾国藩不同，他通过买办们的帮助和外国人的撑腰，在政治和财政事务方面建立了自己的支配地位，他甚至不止一次自己就象一个买办那样行事。还必须认为他是第一个引进现代化的军用武器以镇压接连不断的农民起义的官僚。我们也许可以在这种进口外国武器弹药的活动，发现工业资本给中国农村生活带来的最可怕的影响。曾把长江流域各省的太平军，黄河上游的伊斯兰教徒，河北、山东和河南的义和团以及其他小规模骚动平息下去的历次征讨，证明了成功的秘密取决

于利用西方兵工厂提供的毁灭性武器的能力和机会。当李鸿章在义和团起义期间任广东总督时，广州政府是香港和澳门最好的军火主顾；但是他紧急地要求英国当局和葡萄牙当局切勿把军火卖给“可能做坏事的人”。

在进口的军用武器的基础上，一支现代化的军队在中国渐渐建立起来。但是由于封建主义关系的残余，新军的指挥官们只不过是一伙军阀，他们往往同时是地主和买办。袁世凯是中国军阀第一个最著名的代表。在他之后，象繁星一般不计其数的大小军阀遍布各省。从这些军阀中浮现出一种新式地主，这是由于他们通过收税、从贷款中抽取佣金以及克扣士兵的薪饷养肥了自己。这种新地主比那些属于旧乡绅的地主势力要大得多，因为他们现在可以直接凭借武力收取他们的地租。据说在广东，每一个师长，几乎每一个旅长，甚至大多数团长，在他们的家乡或邻近各县都拥有大片土地。这种购置地产的活动无论何时何地都在进行中，而且这种活动总是非常巨大的交易，土地价格以及随之而来的地租普遍趋于上涨。于是就掀起了一个土地集中的新浪潮。例如在茂名，一名仍在广东地方部队服役的师长，每年能从他占有的土地上获得总数相当于一千八百担谷子的田租。该县全部私人土地提供的全部田租总计不到六十八万二千担。许多人都知道，广东的一个军事长官在香港拥有的实际不动产价值两千万元，但是不一定有人知道，就是这位战神之子在他的故乡所在的县还拥有巨大的田产。该县碰巧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①由于他的土地越过了国界，他还得向法国殖民政府缴土地税。

军阀及其官僚不断地需要越来越多的税款和贷款，以便增购武器弹药，为了镇压农民暴动，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权力，武器弹药是他们绝对必需的。由于田赋负担与随之而来的地租越来越重，由于军阀和官僚采取的财政措施和政治措施过于苛刻，并破坏了平衡，农民破产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在破产农民乃至没有足够的土地耕种的中农普遍揭竿而起之前，得到一切希望维持现状者的支持的统治阶级，只有把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精良的军用武器当作他们最后的防御手段。因此从上个世纪的中叶以来，暴动——军火——税收，或税收——军火——暴动，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当然，其生活由恶性循环和打破这种循环的进展组成的国家并不是中国一个。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总的看来，中国在这方面并未取得任何改善。这也许是由于最近在广东北面并与之毗邻的江西省发生的情况所致。罗马的C.德雷戈尼教授曾于一九三三年由国际联盟推荐参加了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南京政府，他观察到了如下的情况。在江西省那些从共产党人手中收复的地区，目前的当局“只要办得到就力图使土地归还原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承认，所有权不但可以通过正常的方式，例如凭契约和文书来证明，而且也可以通过简便得多的非正式方式来证明。不仅在地界保留下来的时候是这样，即使在地界被彻底破坏的时候也是如此”。“使得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农村重建）委员会从乡绅中吸收成员，他们自然倾向于按他们那个阶级的利益行事，而不是按老百姓的利益行事。后者的处境肯定会比共产党占领之前更糟。总的看来，旧制